



## 海峽兩岸王世杰研究綜述

薛 毅

**摘 要：**王世杰是一位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人物。他曾在教育界、政界、外交界、学术界身居高位，先后在大陆和台湾担任过重要职务，堪称蔡元培以后学人从政之第一人。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峽兩岸的出版机构先后整理出版了王世杰的著作、文集和日记，学术界开展了对其生平志业及影响的研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对海峽兩岸学者有关王世杰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初步总结，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王世杰以及研究民国史、国共关系史及海峽兩岸关系史等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王世杰；海峽兩岸；研究；综述

在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王世杰无疑是一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人物。他一生曾在教育界、政界、外交界、学术界身居高位，先后在大陆和台湾担任过重要职务，堪称蔡元培以后学人从政之第一人。有学者视他为“观察上世纪 30 年代自由知识分子从政的一个标本”。他连续担任重要公职长达 60 年，经历并参与了 20 世纪中国很多重大事件，其中一些活动对近代中国的教育、政治、外交、法律、文博事业、国共两党和海峽兩岸关系等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一生著述颇丰，因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法学方面的学术贡献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到台湾后曾担任中研院院长长达 8 年。鉴于其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大陆与台湾的学术出版机构相继整理出版了王世杰先生的著作、文集、日记等，这些著述已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史料。海峽兩岸的学者开展了对其生平志业的研究，产生了一批成果。本文拟对王世杰先生的生平做一简略论述，并对海峽兩岸的学者有关王世杰的论述做一梳理和初步总结，以冀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王世杰先生以及民国史、国共关系史及海峽兩岸关系史等有所助益。

### 一、王世杰先生生平简述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省崇阳县人。5 岁时，王世杰进入私塾读书。12 岁，他离开家乡来到省城武昌，顺利通过考试，进入南路高等小学堂。16 岁时王世杰从南路高等小学堂毕业，随即考入湖北省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分在理化科，1910 年毕业，当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来到武昌参加起义。王世杰“冒着枪林弹雨进入危城，不只协力守卫，并以都督府秘书身份，奉命赴长沙向湘督谭组安(延锜)先生乞援。谭即指派刚到长沙的广西援军赵炎午(恒惕)旅长率部来鄂”<sup>①</sup>。因在辛亥革命中表现突出，王世杰获得稽勋局公费留学的资格。1913 年，他先后就读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政治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法学专业，相继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20 年回国

<sup>①</sup> 王德芳：《先五叔雪艇先生之遗爱——60 年刻骨铭心》，载《珞珈》1981 年第 67 期，第 41 页。

后,他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和系主任、校代理教务长。1927年后相继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1929年主持武汉大学迁址珞珈山工作,并担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1933年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任职近5年<sup>①</sup>。抗日战争时期是王世杰一生中担任职务最多、最为忙碌的时期。在他担任的诸多职务中,以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的责任最为重大。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王世杰是蒋介石政治和外交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和重要智囊。

从1945年7月30日到1948年12月22日间,王世杰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共签署条约、公约或专约20件,协定21件,换文也是20余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宪章》”<sup>②</sup>。关于王世杰的外交,曾在他之前担任过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王世杰“很谨慎、认真、勤勉,并且是博览群书的学者。虽然直到那时他的经验还不足,但他深切了解委员长(指蒋介石——作者注)对所有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每当出现争论时,他都能提出建议,而且总是迎合着委员长的意图。”<sup>③</sup>1949年到台湾后,王世杰先后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1962年4月28日,“总统”蒋中正特任王世杰为台湾中研院院长。而此任的前任是胡适。从此,王世杰开始了担任中研院院长的8年历程。

1970年,已届80岁高龄的王世杰辞去中研院院长职务,过着恬淡自处的生活。他经常与画家张大千研讨古董。在他的晚年,他曾捐献给台北故宫博物院10幅珍贵字画,都是绝妙精品,国之瑰宝。他还将收藏的从汉代到清代的77幅名人字画暂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88年将其图片编辑出版,书名为《王雪艇先生续存文物图录》。

王世杰先生一生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先后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但在临终前留下遗嘱,他效仿美国总统杰弗逊墓碑上只刻写“维琴尼亚大学创办者”的先例,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只刻写“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之墓”。1981年4月21日,王世杰先生病逝于台北,终年91岁。

## 二、大陆有关王世杰先生研究述评

王世杰先生一生对中国法学与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目前已发现其著作近20部,文章130余篇,主要发表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太平洋杂志》等。

大陆学者对王世杰先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早的研究带有明显的批判特点。例如,北京政法学院1958年曾编辑了《批判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一书;60年代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曾发表范体仁的《现代评论派与王世杰》(载第90辑,合订本第3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陆有关王世杰的文章日渐增多。这些文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介绍性的,例如万亦武的《王世杰——蒋介石的智囊》,吴忠亚的《追怀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老师》(均载《武汉文史资料》29辑,1987年9月版);王和林等的《王世杰家世》(载《湖北文史资料》第29期,1989年12月版);刘双平、宋宏杰的《王世杰筹建武汉大学新校舍》(载《武汉春秋》1996年3期);薛毅的《王世杰与武汉大学的不解情》(载《两岸关系》2007年第4期)等。一类属于学术研究性的,例如华友根的《略论王世杰关于奴婢与妇女地位的法律思想》(载《法学评论》1991年第3期);左双文等的《王世杰与战后对日和约问题的交涉》(载《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薛毅的《王世杰与国共第二次合作》(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2期)等。薛毅在《王世杰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一文中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王世杰参加了国共两党之间举行的主要谈判,并在谈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涉时往往以王世杰为主要对手,并把他作为谨慎合作的对象,其他民主党派也常常把王世杰视为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向其提出意见和建议。”

① 杭立武:《王雪艇先生事略》,载《湖北文献》1981年第60期,第4页。

② 胡国材:《雪公校长在外交上之贡献》,载《湖北文献》1980年第55期,第39页。

③ 《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603页。

还有一些书中有王世杰的传略或生平介绍,例如由何明主编的《民国名人的最后结局》丛书中的《国民政府文人高官的最后结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收录了23位民国时期有重要影响的文人高官,其中王世杰排在第14位。何明主编的另一本《国民党四十三位战犯的最后结局》(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书中也收录了王世杰的传略。这两本书以叙述为主,在对王世杰的生平做简要介绍基础上,重点介绍其晚年事迹,突出最后结局。这两本书中对王世杰的介绍都没有列参考文献和必要的注释,严格地说不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

近年来,中华书局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相继再版了王世杰、钱端升编著的《比较宪法》一书。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华法学文丛”中,收入了王世杰、钱端升编著的《比较宪法》一书,该书的整理者在编辑前言《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判态度》中认为:“在现代中国比较宪法学者中,王世杰和钱端升的影响最大。他们的《比较宪法》一书不仅在20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钱端升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对大陆法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该书的作者最初仅王世杰一人,初版分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于1927年出版,第二年即再版。编辑前言对《比较宪法》的前后版本做了十分细致的比较。编辑指出:王世杰著的《比较宪法》共分五编,分别为绪论、个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公民团体、国家机关及其职权、宪法的修改。王与钱合著的《比较宪法》则分为六编。前五编与王独著的《比较宪法》五编相同,只是增加了第六编“中国制宪史略及现行行政制”。增加的第六编是在王独著第五编第二章“中国制宪问题的经过”基础上扩充而成。该书的整理者在结语中对该书做了三点概括的评价:(1)它是20世纪上半期对西方宪政理论进行最全面客观的著作,它在介绍西方宪制和理论时基本上不含偏见;甚至在对苏联的新制度进行介绍分析时,也不含反共反苏原教旨色彩,比较客观。(2)它开创了以个人基本权利自由理论为宪法研究核心或首要任务的宪法学术体系,它的个人权利高于政府权利的宪政意识,深得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宪政学说之精髓,它的研究成就对彻底革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3)它对当时政治和制宪活动的严肃批评,为中国宪法学术的独立性格树立了良好风范。

由徐正榜等主编的《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收录了王世杰1929年至1933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的10次重要演讲。这10次讲演既有王世杰担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时期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代表出席武汉大学开学典礼时的讲演,也有他正式出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上任时的讲演。

大陆相关的资料汇编和研究著作主要有: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3》(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刘晓琴著:《中国近代留英教育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史料》(《民国档案》1994年2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关于抗战外交及国民精神总动员——军委会参事室座谈会记录》(《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王世杰关于改进中苏关系意见签呈》(《民国档案》2006年2期)等。

由薛毅著的《王世杰传》(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目前大陆出版的唯一一本关于王世杰的传记。为了撰著此书,作者曾三次到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等单位查阅资料,并得到王世杰女儿及其他亲属提供的资料和帮助。这本传记约26万字,书中有约30幅王世杰一生各个时期的历史照片,包括他和中外名人的合影,堪称珍贵。该书附有王世杰先生生平大事年表和王世杰著述目录。

### 三、台湾有关王世杰研究述评

由于王世杰1949年到台湾后先后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中研院院长等重要职务,所以台湾的报纸杂志发表过不少有关王世杰先生的文章。台湾方面发表的有关王世杰的文章大体可分为三类:介绍性、回忆录、研究性。

介绍性的文章主要有:文宣的《王校长雪公九秩记庆》(载《珞珈》64期,1980年6月);于翔麟、美国

煊的《民国人物小传:王世杰》(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8卷6期,1981年6月版);陶英惠的《王世杰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的经过》(载台湾《中国时报》1990年3月10日)和《王世杰与两航案真相》(载台湾《传记文学》56卷4期,1990年4月版);蔡名相的《王故校长雪公日记有关武大及武大人的记述》(载《珞珈》103期,1991年1月);陶英惠的《中华民国名人传:王世杰》(上、下),《珞珈》112期、113期,1992年7月、10月);巫金燕的《王世杰个人档案整理概述》,《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8期,1999年9月版)等。

有关回忆录主要发表在《珞珈》杂志和《湖北文献》杂志。由于王世杰是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因此武汉大学台北校友会主编的杂志《珞珈》自1964年创刊以来,刊载了不少纪念、追怀老校长王世杰先生的文章。其中1980年3月出版的第63期是祝贺王世杰先生90双庆的专辑。刊载的文章既有对王世杰先生一生的行述,也有对其在工作、为人处世、生活等方面的点滴回忆;既有学术性较强的研究论文,也有充满感情的追怀与哀思。回忆性的有景仁的《晋谒雪公校长纪实》(载《珞珈》26期,1970年4月);邓先抡的《我与校长》(载《珞珈》26期,1970年4月)等。由于王世杰先生出生在湖北崇阳,由台湾湖北文献编辑委员会出版的《湖北文献》第55期、第60期分别是纪念王世杰先生90寿辰和逝世纪念专辑。这两辑集中刊载了前“总统”严家淦、国民党元老谷正纲、中研院院长钱思亮、北京大学同学会、武汉大学校友会、李国鼎等的回忆和纪念文章。

研究性文章主要有:赵保轩的《王世杰先生与中央研究院》(台湾中央研究院成立50周年论文集,1978年6月);柯树屏的《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4期,1982年4月);蒋永敬的《王世杰与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台湾《传记文学》53卷3期);廖硕石的《王世杰与中苏友好条约》(台湾《传记文学》53卷第5期)。陶英惠的《王世杰与两航案真相》(《珞珈》104期,1997年7月);杨翠华的《王世杰与中美科学学术交流,1963—1978:援助或合作?》(载《欧美研究》(台湾)第29卷第2期,1999年6月版);杨维真的《从〈王世杰日记〉看战后中法越南交涉》(1945—1946),《台湾《近代中国》161期);陈英杰的《由〈王世杰日记〉看重庆会谈后到政治协商会议前的中共谈判策略》(台湾《政治大学学报》第28期,2007年11月版);蒋永敬的《王世杰传》(载《国史拟传》第8辑)等。

在这诸多论文中,蒋永敬的《王世杰传》是一篇详略得当、史料准确、言之有据、内容可信度较高的论文。这篇文章分11个方面介绍王世杰的一生:(1)家世、求学与教学;(2)建设武大与整顿教育;(3)抗战时期职务繁巨;(4)战时外交决策之嬗替;(5)国民参政会之筹划与协调;(6)宣传方针在应抗战需要;(7)致力中共问题之“政治解决”; (8)签订中苏友好条约;(9)妥协迁就是为阻止崩溃;(10)致力学术与科学之发展;(11)对中华书画的维护与鉴赏。该文引用的史料,既有出自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历史文献,也有毛泽东的文章和中共方面的文件;既有史料的引用,也有对王世杰思想的分析和心态的探索。

除了《王世杰传》,蒋永敬先生的《〈王世杰日记〉中的史事与人物》一文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连载5期(从第61卷第5期到第62卷第4期),同样是一篇颇有分量的文章。这篇长文首先对王世杰的生平和他的日记做了简单的介绍。作者在“苦读”日记的同时,“顺著时间的次序,择其要者加以排列,必要时作背景之说明;或对其相关的记述,加以归类;并在各项要人要事的记述之前加以标题,以资醒目。”

1980年,在王世杰先生90岁生日前夕,武汉大学台北校友会编辑出版了《王世杰先生论著选集》。该选集共分6个部分:学术论著;书评与书序;史料与文物;时事述评;讲演词;追念故旧。前4部分大体上写作于任职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时期;第5部分主要是担任台湾中研院院长时期的讲演;第6部分主要是退休后的访谈记录。第2、3部分有数篇关于故宫文物的文章。

王世杰去世后,其子女于1983年和1985年将其生前所存资料陆续送交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保管整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90年整理出《王世杰先生档案目录》(张玉法主编)。其内容主要包括日记、聘书、函稿、著作、演讲稿、信件、照片、剪报等,也有锦旗等个别实物。在这些档案中,最大宗的应是函件(约占总量的2/3)。“函件之内容也最为复杂,除各式各样之邀请函、致谢函、求职求助函、赠书赠物函等酬应函件外,其他尚有任职总统府秘书长时期之部分函件,以及各界人士对中研院之各项建议函、故宫出版物、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中美合作交流……等等本应属于专卷性质之函件,但因形式上属

信函性质，且不尽专谈某事，故仍将之并入函件中。”<sup>①</sup>

陶英惠先生著的《典型在夙昔——追怀中央研究院六位已故院长》(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一书中，有约两万字的《王世杰传》和评述王世杰日记史料价值的文章。在《王世杰传》一文中，作者对传主的一生分为家世、求学经过、任教北大、初入仕途、武大校长、教育部长、抗战时期之重要职务、在国民党内之职务、在外交方面的贡献、与中央研究院的深厚关系、对故宫文物的维护与宣扬、重要著述、结语等若干部分，比较全面、系统、概括地介绍了传主一生的主要经历，对其在教育、学术、外交、政治等方面的所作所为及其产生的影响，作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对一般读者了解和认识王世杰的生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秦孝仪主编了《王雪艇先生续存文物图录》(1988年版，前文已有介绍)。

1990年3月10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为了纪念王世杰先生百岁诞辰，影印出版了《王世杰日记》，共计10册，第10册书后附有日记中提到的人名字对照表。关于这套日记的价值，台湾学者认为由于“王世杰丰富的政治经历，加上为人严谨，其长时间所撰写的日记也就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可靠而完整的素材。”台湾学者对王世杰研究成果较多的蒋永敬先生认为：“王在从政期间，参与最高阶层的决策，接触面至广且深，与许多‘要人’之间，频有接触，对其言行举止，或鲜为外人所知的趣闻趣事，王之了解亦多。最为难能可贵的，王在从政数十年中，留下珍贵的日记。对其所接触的要人，及其所经历的要事，能够留在日记中，成为研究民国的‘人’与‘事’最珍贵的史料……所记要人要事，可读性至高……有许多记述，堪称‘政海秘辛’。”

台湾一些高校也有研究生以王世杰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例如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2届研究生徐保达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王世杰与民国政治》等。

台湾方面既出版了《王世杰先生论著选集》，也出版了10卷本、厚达数千页的《王世杰日记》。武汉大学台北校友会主编的《珞珈》杂志在王世杰诞辰80、90、100周年时多次刊出纪念特刊，刊出了大量有关王世杰先生的论著和相关文章，应该说为比较全面、系统、客观、公正研究王世杰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为什么长期以来台湾方面至今没有《王世杰传记》和全面研究王世杰的著作问世呢？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王世杰日记》虽然史料价值很高，但作者全部用毛笔记载，缺少书法知识的学人难以辨认，成为进行研究无法逾越的障碍；且已经出版的日记不够完整。《王世杰先生论著选集》和《珞珈》杂志均由武汉大学台北校友会主编，没有公开发行。王世杰的史料分散在海峡两岸，研究者查阅和利用颇多不便。截止目前，台湾有关王世杰的研究多系针对其生平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开展的专题研究。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王世杰先生经历并参与了20世纪中国很多重大事件，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决策者或见证人，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一个人物。曾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杭立武称其为蔡元培以后“学人从政之第一人。”<sup>②</sup>大陆有学者视其为“观察上世纪3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从政的一个标本”，这些称号对于王世杰来说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由此可见，对王世杰先生的著述进行整理，对其生平志业进行研究，对其作用和影响进行定位，具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认为，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在王世杰研究方面已经取得可观的成果。同时应该指出，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瑕疵。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战争》(1937—1945)一书的第491—492页有如下一段记载：“1943年10月初，张君勱、褚辅成、左舜生、李璜等人正式提出了改善出版检查办法的要求，提出宪政实施的筹备工作应将重点放在言论自由的逐步开放方面。在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的当天，一些会员就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数项关于改善新闻检查及书籍审查办法的提案。不久，张君勱又提出《人民基本权力三项保证案》，黄炎培随即提出对张案的呼应措施。面对人们的

<sup>①</sup>巫金燕：《王世杰个人档案整理概述》，载《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9年第28期，第130～131页。

<sup>②</sup>王德芳：《先五叔雪廷先生之遗爱——60年刻骨铭心》，载《珞珈》1981年第67期，第5页。

强烈呼吁,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也感到“图书审查制度首须改革或撤废”。他向蒋介石进言,提出“对于图书及不以记载政治新闻为目的之杂志,废止强制送审办法。”<sup>①</sup>

历史事实是,抗战期间王世杰曾两度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第一个任期从1939年12月至1942年12月,历时3年。第二个任期从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夕,为时8个月。上引书中对王世杰日记的引述一条是王世杰1944年4月6日的日记、一条是4月22日日记的部分内容。而这一时期王世杰并不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任上。

再如: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助理巫金燕的《王世杰个人档案整理概述》(发表在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8期,1999年版。)一文,介绍了王世杰去世后其子女将其父的日记等文字和照片等档案移交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过程和该馆整理这部分档案的过程,并对档案的内容做了简要的介绍。这篇文章存在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例如,第128页谈到的王世杰1936年任教育部长,实际上应为1933年;王担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时间也不够准确。第132页提到王世杰1962年接替朱家骅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实际上王的前任是胡适而非朱家骅。

还有,由裴斐(Nathaniel Peffer)、韦慕庭(Martin Wilbur)访问整理,吴修垣译,高云鹏译审,马军校注的《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第6页有一张有关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的照片。照片说明为:“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吴国桢(后排右一)与毛泽东、蒋介石、赫尔利、张群、蒋经国的合影。”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吴国桢并未参加过重庆谈判,站在毛泽东后边的是王世杰而非吴国桢。该书第31页有一张吴国桢担任上海市长时在办公室的个人照片,细心者如做比较,就可以看出两张照片中的区别。

总而言之,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王世杰是一个留下较深痕迹的人物。他连续担任重要公职长达60年,经历并参与了20世纪中国很多重大事件,其中一些活动对近代中国的教育、政治、外交、法律、文博事业、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关系等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开展对王世杰先生的研究,对于深入研究20世纪中国的外交史、教育史、法制史、国共关系史等,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对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有关王世杰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介绍一些资料线索,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冀推动王世杰先生研究的不断深入,正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所在。

● 作者简介:薛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桂莉

<sup>①</sup>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王世杰日记》(手稿本)1991年第4册,第286页、294~295页。